第 53 卷 第 2 期
2016 年 3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 No. 2
Mar. 2016

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的前前后后

刘青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以传统诗词创作和研究著称的夏承焘先生,其学术无疑是以旧学为根柢的。但作为 20 世纪的同龄人,他早年曾往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听胡适等新学巨子讲授《白话文法》等课程,并深受胡适等新文学史家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具体到词学方面,夏氏曾反复阅读胡适《词选》,并于 1928 年作《致胡适之论词书》与其商榷具体的词学问题,尽管不得回函,但他此后对胡适学术的关注并未由此中断,其词体起源说及词史观仍多有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视角影响的痕迹。研究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的前前后后,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夏承焘词学思想的渊源,同时也可以见证 20 世纪新旧学交汇的具体个案。

关键词: 夏承焘;胡适;词学;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新旧学
中图分类号:I 2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2-0137-11

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是重要的词学文献。这封信写于 1928 年 8 月夏承焘读胡适《词选》之后,最初刊载于《文献》1980 年第二辑,后收入《天风阁学词日记》。1994 年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秘藏书信》中又收录该函之影印件,在文字上与《日记》本有较多出入。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词选》一书也历来被视作是对旧学的反动,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一起,对 20 世纪词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后来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在写这封信时,尚属正在成长中的后辈学人,对新学有较浓厚的兴趣,此前曾往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听胡适等新学巨子讲授《白话文法》等课程,并深受胡适等新文学史家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根据夏、胡二氏日记所记可知,虽然胡适没有回信,但夏对胡适学术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夏氏治词,从传统的词人年表、词谱等入手,总的来说是根柢于旧学的,但其词体起源说及词史观仍多有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视角影响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承焘对胡适词学的批评和接受,实为 20 世纪词学的一段重要公案。对此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夏承焘词学思想的渊源,同时也可以见证 20 世纪新旧学交汇的具体个案。本文立足于此,主要以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为焦点,探讨此前此后他对胡适学术的接受,尤重其在词学观上对胡适的接受与辨正,以此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

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是夏氏和胡适在词学上唯一一次学术交流和碰撞,但并非夏承焘与新学巨子胡适的首次接触。应该说,夏承焘和胡适两人在学术上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是相当早的。其中一个重要事件,即夏承焘于 1920 夏天前往南京参加南高暑校。这应该是夏承焘和胡适的首次接触,夏氏在年谱和《我的学词经历》中都有记叙。从他给朋友的书信以及与师友的谈论中都可以见出,这一个半月的进修是他早年求学经历中的一件大事;就学术道路而言,则是他亲沐新学巨子、对新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起点。

根据《夏承焘学术活动年表》等相关文献的记载,1920 年 7 月 7 日(农历 5 月 22 日),夏承焘乘船离温,9 日抵达南京①。当时任教于任桥小学和温州布业国民小学的夏承焘前往南京听课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暑校国语讲习所"专教关于

收稿日期:2015-10-18
作者简介:刘青海,女,湖南华容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① 据卢礼阳《夏承焘未刊手札考释》(《文献》季刊 2012 年第 1 期)所录温州图书馆藏夏承焘致慎社社友函。

国语方面各学程,以养成国语教员为宗旨”的吸引,希望在小学教育方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苦无名师指点”,“想于 7 月间乘机投考高等师范”,以求继续深造。因此,在 8 月 21 日暑校结束以后,夏承焘复停留南京一月有余,但终究以家庭经济苦难,且数学、英语准备不充分而放弃投考。①

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所聘之教员,除夏承焘提到的胡适、郭秉文等“新学巨子”之外,尚有胡先骕、刘经庶等后来被归为学衡派的旧学巨擘,可谓人才济济。夏氏自言“听了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他许多新课程”②。而胡适是其中予夏氏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老师。暑校结束后,夏承焘“作《墨子哲学长处和短处》语体文”③,可以看作是他学习白话文法后的一次积极尝试。胡适对墨子一直兴趣浓厚,1919 年 11 月 20 作信与梁启超,思一谒见,“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④。梁启超 1921 年出版《墨经注释》,特请胡适作序,亦可见胡适在墨学方面的成就。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课上,无疑会谈到墨子。因此,这篇语体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夏氏听胡适《白话文法》和《古代哲学史》两课的一个综合成果。

暑校为期一个半月的《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课程,让夏承焘对胡适的学术有了最初的了解和评价。课程结束后大约月余,夏承焘拜访老师张棡(震轩)时,尚很激动地谈到这次南京之行。张棡当天的日记这样记载:

> 下午,夏生承焘来访……又言胡适之在南京演说,语尚中肯,谓人必须先蓄根柢乃可言新文化也。而西国罗素先生新来中国演说,其主张则劝中国宜以保粹为主义,新文化潮流总觉太急躁也。按此说与杜威博士不同。⑤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夏氏评价胡适的最早记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张棡日记进一步证实了夏承焘在暑校印象最深的老师是胡适,其对胡适演说的兴趣则主要在于新文化,而尤其关注其中新学与传统旧学之关系。夏承焘以胡适“谓人必须先蓄根柢乃可言新文化也”之语为中肯,正因为他自己的学术总的来说是以旧学为根柢的。西哲罗素对中国文化“宜以保粹为主义”的主张,大抵得之于胡适在课堂上的称述⑥,也是夏氏本人感兴趣的问题。张棡谓罗素的态度与胡适的老师“杜威博士不同”。杜威 1919 年在杭、沪、京各地演讲,胡适随行充当翻译,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件大事,报章竞相报道,僻处温州的张棡知道,在教育界任职的夏承焘应该也有耳闻。则他对胡适的关注,当远早于 1920 年。

夏承焘去暑校听课,慕胡适之名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陶行知同年六月九日致胡适之信中所说的:“这次报名的人几乎无人没有你的功课,还有许多小学教员特为要学你的白话文法,不远千里来到这里。”⑦夏承焘正是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许多小学教学中的一名。胡适《白话文法》课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是因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于 1920 年年初首度发布废止文言、采用

---

① 夏承焘:《我的学词经历》,《文史知识》1981 年第 1 期。

② 夏承焘:《我的学词经历》。这里的“其他许多”,据 1920 年 6 月 9 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一览》,应包括梅光迪《文学概论》、刘经庶《近代西洋哲学史》,以及周椝《注音国语》、陈鹤琴《实验教育心理学》、陶履恭《教育社会学》、俞子夷《小学教学法》等课程。

③ 吴无闻辑:《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吴无闻等编:《夏承焘教授纪念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15 页。

④ 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72 页。

⑤ 俞雄选编:《张棡日记》,1928 年 10 月 21 日(农历九月初十)《夏生承焘来谈南京苏州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温州文献丛书》本,第 283 页。

⑥ 罗素首次访华在 1920 年 10 月 12 日。《申报》早于 7 月 11 日披露此消息,《新青年》等刊物对他的生平思想进行了大量介绍。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陶行知致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01 页。《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6 册收录其影印件。

国语的法令,规定到 1922 年年底,文言教科书全部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此时距离白话文运动的开始不到一年,各地中小学教员多有如夏承焘这样从旧学出身者,自己都不会白话文,何以教人? 因此胡适此课的开设,实乃解其燃眉之急。根据当时听课的四名学生给胡适的一封"抗议"信①,可知当时胡适《白话文法》课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指导人如何去写作和研究白话文,正能够满足各地小学教员的迫切需要。与夏承焘差不多是同龄人的章衣萍(1902—1947)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中,也提到胡适"课堂上真是人山人海"的盛况,且言其讲演"清晰而有趣味",甚至"许多教授、学生,都流连梅庵,叩门请益"。② 夏承焘早年读书以传统的四部为主,他未必就此信仰胡适,也没有到胡适所住的梅庵叩门请益。但胡适所谈论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主张,必定会对他的思想产生相当的震动,这是无疑的。③

上面我们对夏承焘参加南高暑校一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借以窥探夏氏早年在新学上与胡适之间的渊源关系。夏氏早年对于胡适的基本态度,由于文献有限,只能由此约略窥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旧学修养深厚的夏承焘对胡适的接受,和当时一般人不太一样,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对胡适有关新文化的演讲,评为"语尚中肯",态度比较谨慎。而在六年后的日记里,他直斥胡适所拟国学书目为"甚无理",而许梁启超所开国学书目为"稍较平允",可见对胡适的接受度反不如对梁启超的接受:

> 午后阅龙启瑞《经籍举要》一本……袁昶增其大半。龙原本甚少,同时邵位西诋其简略,经袁增补,近代各要书方得其大凡。近人梁任公、胡适之各开国学书目,胡甚无理,梁稍较平允,然亦不能出此规范。(一九二六年八月廿二日)④

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最早是应清华大学生所拟《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 190 种),1923 年 3 月 4 日发表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 7 期上。后来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要求,改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近 40 种),登载在同刊第 8 期上。夏承焘所见,或是前者。夏承焘说胡适书目"甚无理",正如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论"挂漏太多""博而寡要",略引一段如次:

> 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 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⑤

梁启超和夏承焘对国学的理解,更多的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胡适将史部摒除,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这样在传统上被归入"小道"的作品列入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导致梁启超"文不对题"的批评,夏承焘应该是赞同的。梁启超和胡适关于国学书目的论战,在当时报刊上也有登载。夏氏"胡甚无理,梁稍较平允"的评价,当针对此种争论而发,而左袒梁,正可见他自己的立场,仍旧是植根于旧学的。

要之,1920 年前后的夏承焘先生,通过南高师暑校的亲炙受教以及阅读报章文字,对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白话文写作虚心学

---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第 1148 页。

② 此文后收入《衣萍文存》,乐华书店 1933 年版。本文所引据章衣萍:《窗下 枕上 风中随笔》,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2—133 页。

③ 可惜夏氏此期日记为稿本,笔者无缘得见。

④ 转引自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周笃文、钱志熙主编:《全国第二十四届中华诗词暨夏承焘吴鹭山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 页。

⑤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 7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44 页。

习,对西学和新文学也颇感兴趣,但对其国学则有所保留,不如对梁启超之敬仰。

二

夏承焘和胡适之间的重要事件,1928 年夏氏读胡适《词选》,作《致胡适之论词书》。《词选》是胡适从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视角出发,以新学方法而摩旧学之垒的一个成果。夏氏致胡适之信中,虽于其“调早于词”等具体问题有所商榷。但考之于其以后的词体起源说及词史观,皆多有受此观点影响之痕迹,对研究夏氏词学的发展关系甚大。

胡适《词选》于 1927 年 7 月初版,1928 年 5 月再版。封面题“新学制 高级中学国语科用”,可见当时是作为高中国语教材来使用的。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①:“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龙榆生此文初刊于 1933 年,距离《词选》初版已有六年之久。夏承焘 1928 年在严州中学任教,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作《词林年表》与《词人年谱》,因此他对胡适《词选》的关注要较一般研究者为早,其看法亦较一般研究者较专门。

据《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氏第一次读胡适《词选》为 1928 年 8 月 2 日,此后数日读之不辍。他发现《词选》中各词人小传“有可据入《词林年表》。而书后附录之《词的起原》,“谓长短句起于中唐,考订颇确凿”(8 月 2 日)②。细读之下,发现“有数处可商榷”(8 月 3 日),遂于次日“作一函致胡适之,未发”(8 月 4 日)。其后 8 月 6 日,“阅胡适《词选》,以晚唐至东坡以前皆娼妓歌人之词,《花间集》全为给歌姬唱者,此语亦须斟酌”。8 月 7 日“发胡适《词选》”订其《词林年谱》,发现“《词选》有一处误”。18 日、19 日两日将信写定,并寄去自作《词有衬字考》一本:

> 作致胡适之书,诘其《词的起原》篇论调早于词。此君往往武断自是,恐不肯作答。(18 日)
>
> 发胡适之上海中国公学一函,论词,并问作《学术大事表》,附《词有衬字考》一本”。(19 日)

这封信从开始写到写定寄出,历时有半月之久,可见夏承焘当时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既与论词,又寄去自己著作以请益,则此番去函,非但商榷学术,实有借此与胡适论交之意。夏氏既担心胡适“往往武断自是,恐不肯作答”,仍写信与之论词并向其请教学问之道,可知他对《词选》中所体现的胡适词学是相当佩服的,并由此成为他认识胡适学术的新起点。随后他又比较集中地读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并且此后一直不曾因未收到回函而中断对胡适学术的关注,都是建立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的。

1980 年,夏氏偶然在当年日记中发现该函的底稿,并应邀发表于《文献》1980 年第 2 辑。信之前有夏氏按语,对写信时的情形作了简要说明:

> 这封信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起草、同月十九日发出的。当时我二十八岁,在浙江严州中学任教。授课之余,开始研究词学。胡适《词选》中的各词人小传,我都札入《词林年表》。胡著附《词的起原》,谓长短句起于中唐,考订颇确凿。胡著亦有数处可商榷,故写了这封长信与他讨论。③

与《日记》本相比,《文献》刊《致胡适之论词书》多了落款“敬颂著安不次”六字,还有两条脚注也是《日记》本所无(双引号为笔者所加):

> 注一:《荔枝香》云云,陈元龙《片玉集》注云:“见《唐礼乐志》。杨妃外传亦云。”
>
> 注二:《东坡乐府·醉翁操序》云:“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馀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其有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馀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此先有曲后有词,但欧公当时已

---

① 《中国与文学丛刊》1933 年创刊号,第 4—11 页。后又刊于《词学季刊》1936 年第 3 期,第 1—10 页。

② 本文所引《天风阁学词日记》,皆据《夏承焘集》第 5—7 册。为避繁琐,只注日期,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③ 《文献(丛刊)》1980 年第二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73—76 页。

为作词。

注一说明出处,注二引新材料以证,应当都是夏氏在刊出前所加,所以不见于《日记》本。1981 年,夏氏“应施蛰存先生之嘱,始选抄部分日记,刊载于《词学》创刊号①,名之曰《天风阁学词日记》”。② 1982 年,《天风阁学词日记》(1928—1937 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夏承焘集》。这便是录本《致胡适之论词书》的来历。

夏氏之论词书,若得胡适作答,二人往返论学,未始不可成就一段佳话,如其与龙榆生、张采田、彊村老人之学术交往。不料,信寄出后,始终未得回音,就夏承焘而言,倒像是坐实了他在写信时“此君往往武断自是,恐不肯作答”的猜测。但胡适素好论学,且最重实证,夏氏信中所论,言必有据,应该是很能引起他回应的兴趣的。然而翻检以完全著称的《胡适日记全集》第 5 册(1928—1929),这年八月正逢胡适腰痛不能作事,所以下旬至 30 号方有一篇日记,且并未提到夏函。那么会不会是胡适没有收到此函呢?幸运的是,我们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1 册发现了胡适处所藏夏函之影印件。我们由此确认,这封论词书胡适收到了,也读过,并且一直妥为保存。不作答的原因,恐怕是当时代理中国公学校长事冗,又兼中国教育文化董事基金会董事,且因“腰痛”病不能作事,所以不及作答。后来胡适的兴趣就转到了别的方面,不再从事《词学》的研究,也就不复再答。随侍晚年胡适身侧、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的胡颂平也是温州人,其《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涉及不少温州名人掌故,也没有提到夏承焘。因此,胡适对夏承焘此函的印象,至少事后并不很深。从胡适方面来看,他和夏承焘的关系,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叙述。尽管两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譬如胡适的知交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邓广铭等,都与夏承焘有很多交往。同时,与胡适在学术上有分歧并被他目为“温州学派”的陈黻宸、林损(公铎),都是夏承焘家乡的重要学人,且夏承焘跟林损也有交往。很遗憾,很早就关注胡适词学并且渴望与其论学的夏承焘,因为没有得到胡适的回信,此后也就不再主动联系胡适,两人也再无交往的机会。

将胡适所藏夏承焘函影印件(1824 字,下称原本)与《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所附《致胡适之论词书》(2360 字,下称录本)对照,二者内容颇有出入,实有仔细校考之必要。原本末段(143 字),乃另起一纸,内容是问作《学术大事表》,对照前引日记,可知为 8 月 18 日新补无疑:

> 再启者:承焘曩编《词林年表》,顷欲广之作《中国学术大事表》,列学者、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或并入思想家)数种,分部编年,汇为一表。以事体大,�István巡未敢下手。此一类书,外国已有成规否?为之不致“无益费精神”否?体例当否?宜如何编辑?先生爱奖掖后进,倘肯见教一二乎!夏承焘上 八月十八

而原本反较录本少五百余字,主要在于录本末论刘过词风一大段(625 字)不见于原本:

> 又尊著于各词家小传,评骘作风,时有新解,如论东坡、论稼轩、论白石、玉田皆至佳;考证时代,亦有补于拙作《词林年表》。惟第六篇评刘改之,谓其词“属于辛弃疾一派,直写感情,直抒意旨,虽不雕琢而狠用气力”,似犹以豪放目刘词。改之自有浓挚缠绵处,况周颐曾举其《贺新郎·赠张彦功》云:“谁念天涯牢落况?轻负暖烟浓雨。记酒醒香销时语。客里归鞯须早发,怕天寒风急相思苦。”前调云:“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红香尚软,料彼此销魂肠断。”又云:“但托意焦琴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祝英台近·游东园》云:“晚来约住青骢,踏花归去,乱红碎一庭风月”数语。谓“此等句是其当行本色,蒋竹山伯仲间耳。其激昂慷慨诸作,乃刻意抚拟幼安,如《沁园春》‘斗酒彘肩’云云,则尤抚拟而失之太过者矣。”(《蕙风词话》二)况氏谓刘之词格本不同辛,颇有特识。大著能见到辛词永久价值在于“言情写景无不佳妙”之小令,胜悲壮激烈之长调,而于刘词似尚未见其全。况氏论词,时有腐论,如言守律有至乐之境(《词话》卷一第八页),初学词宜联句和韵(《词话》卷一第九页),作咏物咏事词须先选韵等是;即其论刘词忽涉及《词苑丛谈》载改之遇琴妖事,大发议论,谓:“《龙洲词》变

① 《词学》创刊号,1981 年 11 月初版。

② 《天风阁学词日记·前言》,《夏承焘集》第 5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易体格,迎合稼轩,与琴精幻形求合何异”云云,亦妄诞可笑。而此节谓刘之词格本不同辛,颇具独见。大著所选词,脱落故常,自标准则,允能“表现个人见解”,然于前人是处,似亦不可一笔抹煞。此为小疵,敢附求全责备之意,申论于此,倘亦不以为妄言乎?

上述两段文字的有无,是录本和原本最大的出入。因目前所见原本一共三页,“再启者”一段前面恰好满两页,则“又尊著于各词家小传”一段很有可能是原本的第三页(如此则“再启者”一段成了第四页),可能夏承焘在寄信时有所顾虑,将其抽出未发;当然也可能四页都寄到胡适,第三页后来散失。以情理而论,前一种可能更大。

此外,录本尚有两段材料(都出《词苑丛谈》),为原本所无,应是夏承焘在将信寄出后发现了新材料,事后补入的:

《词苑丛谈》谓“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

《词苑丛谈》卷一引俞少卿说:词调有一调数名者,“大抵一调之始,随人遣词命名,初无定准。”要当先有词而得名。

《日记》1928 年 7 月 31 日有“翻《词苑丛谈》”的记载,可见该书就在手边。且该函专论“调早于词”问题,夏氏翻得新材料,有以证之,随手补记于空白处,这是很自然的。又原本“三条皆足助证”一段,括弧内“惟《词源》云”一段,录本无“惟”字,且将括弧内文字移出另起一段。两相比较,原本为优。

行文上,原本和录本有语气的不同,兹列数条如右:

适之先生撰席:顷读大著《词选·词的起原》篇,获益良多。(录本)

适之先生:昨者始得读大著《词选·词的起原》篇,名通之论,叹服无已。(原本)

臆妄之见,不知足当先生一哂否?(录本)

臆妄之见,知可通否?(原本)

《词源》云:(略)此虽亦出宋人,而概泛之语,未举实证,当不足翻前说。(录本)

(惟《词源》云:(略)此说虽出于玉田,谓长短句起自隋唐以来,然概泛之语,不举实证,当不足翻前说。)(原本)

王先生所谓开元《教坊记》中之《望江南》《菩萨蛮》曲调,至李卫公、宣宗时始有词,则窃不敢信。(录本)

王先生谓开元《教坊记》中之《望江南》《菩萨蛮》曲调,至李卫公、宣宗时始有其词,则窃不敢甚信。(原本)

臆测如是,不敢以为必然。客处僻左,求书不易。王先生梁木已坏,无从请益,谨以俟教于先生。(录本)

臆测如是。客处僻左,无从翻书。谨以俟教于先生。倘鉴其向往之诚,乞告我佐证为荷!敬承著安!　　八月十八日,夏承焘自严州上。(原本)

上述数条,原本语气较录本更恭敬、客气。结合夏氏与胡适二人在词学研究上地位的升降,以及解放后胡适其人其学在大陆长久以来受官方冷遇的情况,夏氏作出此种调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夏氏词学观早已成熟,改“不敢甚信”为“不敢信”,一字之差,正体现出夏氏此时(八十年代)在学术上的自信。此外,还有为表达准确起见,个别句子的位置有调整,或字句有增减,此不一一列举。

要之,1928 年的夏承焘先生,虽然对胡适有关词学的一些具体观点——如《词的起原》“调早于词”说、《序言》“晚唐至东坡以前皆娼妓歌人之词,《花间集》全为给歌姬唱者”说——有所质疑,但认为胡适“谓长短句起于中唐,考证颇确凿”,在词体起源说和词史观念上对胡适无间言,并且深受胡适以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论词的影响。后来随着他在词学研究上的不断深入,他对词体的起源和词史发展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胡适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视角对他的影响则是终身不衰的——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加以展开论述。

三

胡适《词选》甫一面世,便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一起,同被视为对晚清词学的反动,如《国闻周报》新开设的《中外书报介绍与批评》栏目第一篇对《胡适之选注本〈词选〉》的介绍即是如此①:

① 《国闻周报》1928 年 5 月第 5 卷第 14 期,第 1—2 页。

有清三百年间,词人辈出,秀水之朱(彝尊),则步武姜(夔)、张(炎);武进之张(惠言),则崇尚寄兴;至晚近临桂之王(鹏运)、归安之朱(彊村),则奉梦窗为圭臬,非守四声、协阴阳,不足以填南宋人慢词,一若词至今日,尚可付檀板金尊、小红低唱者,甚矣其惑也。能发其谬而反之正者,二十年前有海宁王国维氏,今又有胡适氏。王氏论词,独标意境不隔之说,于两宋人之词已少许可,虽所论不无过火,然举世靡靡,非此不足以震发人之耳目也。至胡适所论,详见其所辑《词选》序。

在介绍了胡适《词选序》词的分期说之后,对该著提出了三点批评:一是在观念上,批评《序》"以元至明清之际之曲子时期列入词之历史中",淆乱了词、曲之界限;二是在文献上,批评《词选》"第一二编所录,大都为婉转绵丽之情歌,然敦煌石室所出之《云谣集》如《凤归云》《浣纱溪》等词,乃至一字不录。又金人词如吴彦高、蔡松年、元遗山之作似当录入第六集中,然亦屏弃若遗";三是在体例上,"录白石诸词题颇有删节,使读者不见其全,且大损文章之美"。这三方面的批评,应该说是允当的。《国闻周报》是当时"全国销量最大之定期刊物",本篇不书撰人,但很能代表当时在新学思潮下对胡适《词选》总体上肯定而在具体问题上有商榷的态度。

夏承焘与20世纪同龄,既具备深厚的旧学修养,同时也深受西学和新文化运动风潮的影响。1919年任桥小学任教时,夏氏"响应五四运动,组织任桥小学学生为十人团,到附近地区演讲宣传。五月,作滑稽画数幅,寓意时事,张之校壁,以教育学生","八月,在方岙宣传演讲,讲题为《救国要道在国民各尽其责》"。① 可见他对时事的敏感,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1920年又参加南高暑校,亲聆胡适宣讲白话文和新文化革命,并学作语体文。1921年7月至10月,夏承焘在北京《民意报》副刊任编辑,撰稿中有长篇小说《青年镜》(未完),此稿笔者虽未寓目,但可断定是白话文作品。此后陆续有作白话文,如1922年4月作《什么叫作人格救国》,闰五月为学生会作《劝妇女放足文》;1927年9月,他写作小说《初别》、《羞的故事》。② 因此,当他在1928年8月读到胡适以白话文为标准的《词选》时,夏承焘总的态度是肯定的,和前引《国闻周报》一样。他认为胡适"于各词家小传,评骘作风,时有新解",这个新,正是来自白话文学的标准。但此时的夏承焘,治词生涯才刚刚开始,词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着手在作的《词林年表》和《词人年谱》为传统的谱系之学,对于整个词史的分期和发展,可以说尚无自己的看法。因此,无论是日记还是《致胡适之论词书》,当时的夏承焘都没能跳出胡适的框架对其词史观加以审视,因此他在日记中说胡适"考订颇确凿",商榷的问题如《词的起原》"调早于词"说、《序言》"晚唐至东坡以前皆娼妓歌人之词,《花间集》全为给歌姬唱者"说,也都是相当具体的问题。又如1928年9月11日夏承焘为梦窗词系年,指出胡适《词选》梦窗小传数处有误:"其词年月可考最早者,有《思佳客 闺中秋作》,作于嘉定十七年(1224)据朱氏小笺、宋史,是年闰八月。胡适谓吴(文英)词只有一二三六至一二五一年可考者,误。胡只据其《探芳信·丙申岁吴市灯盛……》一首最后者《莺啼序 丰乐楼》,据朱笺淳祐十一年作。胡适驳毛晋跋《梦窗丙丁稿》,以此为梦窗绝笔为误。亦误。虽不能必为绝笔,然确然为吴词有年月可考者最后之作。周密《蘋洲渔笛谱》《拜星月慢》作于景定四年(1263),别题为《寄梦窗》。刘毓崧据为梦窗此年尚在。胡适假定梦窗卒一二六〇年,尤误。"再如1929年5月9日"考订(韦)庄当生于文宗开成元年或二年约公元八三六年。胡适《词选》误迟二十年矣。"都是就具体问题的考据提出异议的例子。

夏承焘在信中盛赞胡适"长短句起于中唐"说,这是他当时的观点。后来他将敦煌词视作民间词,并以其为词的源头,这固然是他超越胡适、郑振铎的地方,但他所持的民间文学观念,又是受到从胡适到郑振铎这一派新文学史家影响的产物。郑振铎是夏氏早年同学,二人私交甚笃。夏氏1929年9月14日日记:

① 吴无闻辑:《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吴无闻等编:《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214—215页。

② 吴无闻辑:《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吴无闻等编:《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215、217、222页。

> 阅《小说月报》二六六号郑振铎《词的启源》。谓词与五七言诗不发生关系。据《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句,谓"里巷与胡夷之曲,乃词之二大来源"。又谓依腔填词,始于裴谈、温庭筠。以绝细绝腻之笔,写无可奈何之相思离绪,始为文人之恋歌,而非民间之情曲。吾所见郑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

郑振铎和胡适一样,用民间文学的观念来研究词的起源,重视里巷与胡夷之曲,这对夏承焘的词史观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国闻周报》所指出的,《词选》没有注意到敦煌词,是该著在文献上的一大缺陷,这也影响到胡适对词体起源的判断。和胡适同为新文学史家的郑振铎注意到此点,在其所编《世界文库》第六册(生活书店 1936 年)中收录《云谣集杂曲子》共 30 首,并在跋语中强调其在词史研究上的价值:"抑其作风尽多沉郁雄奇,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①夏氏 1936 年 8 月 6 日日记:

> 校敦煌词毕,为作一序。世人谓东坡覆花间旧辙,始廓大词之内容。其实敦煌词已有咏身世、咏战争者,与晚唐诗无别。至飞卿诸人,专以为酒边花间之作。五季承之,乃成敝风。坡公可谓复古,而非开新。

夏承焘认为东坡以诗为词,不是对花间词的革新,而是对敦煌词的复兴。这一不以花间词为正宗的新观点,很难说没有受到前引郑振铎将敦煌词之雄奇豪放与苏辛派词风相联系的启发。在其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开明书局 1938 年)中,郑振铎对敦煌词的民间文学性质有更多阐述。不过,虽然重视词的民间文学起源,也注意到敦煌词在词史研究上的价值,但郑氏始终没有将词的起源与敦煌词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考虑。

在词的起源和词史问题这一方面,相比胡适和郑振铎,夏承焘将民间文学的立场贯穿得更加彻底,论述也更有系统。他于 1957 年 1 月 12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唐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风格》时说:

> 我们试看敦煌曲子词(大都是唐代民间作品),论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民族矛盾、妇女生活等,和元白新乐府几无分别(任二北先生有说);论语言作风,直率奔放的如《菩萨蛮》(枕上发尽千般愿)等等,简直是汉乐府"上邪"的姊妹篇。你能拿"婉约"的标准不承认它是词,不承认它是词的祖宗吗?②

同样,其《瞿髯论词绝句》云:

> 乐府谁能作补亡,纷纷绮语学高唐。民间哀怨敦煌曲,一脉真传出教坊。(《唐教坊曲》)

都是将作为唐开元教坊曲"一脉真传"的"敦煌曲"作为"词的祖宗",由此将词体的起源追溯到隋唐之际,为胡适和郑振铎所不及。他在更早发表的《唐宋词叙说》(1955 年)一文中对此也有明确论述:

> 有人给它溯源到《诗经》、汉乐府的长短句,也有人说它起于中唐诗人"依曲拍为句"作《忆江南》等调。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根据现有的文献,我们晓得隋唐之间的确已有合乐的长短句的词。它的产生时代可能犹在唐代"近体诗"产生之前。前人把它叫作"诗余",也是不合事实的。③

根据前引《致胡适之论词书》中所云"又大作以长短句词调起于中唐,引刘禹锡集中'依《江南》曲拍为句'一语,证据极强",可知夏承焘此处否定的"也有人说",所指正是胡适"长短句起于中唐"说这一派,其中当然也包括早年的自己。但他在《致胡适之论词书》中不同意胡适"调早于词"说,1980 年刊该信于《文献》丛刊时又增加了一条新材料,可知他对"调早于词"说的反对是前后一贯、并未改变的。

1928 年以后,夏承焘又多次翻阅《词选》,尤其是《词人小传》部分所录文献和观点,后者对他的研究也时有具体的触发。如 1934 年 11 月 5 日记道:"作《张泌考》。翻胡适《词选》,亦先疑泌、

① 郑振铎:《云谣杂曲子跋》,转引自陈人之、颜庭亮编:《云谣集研究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 页。

② 1957 年 2 月 13 日写成于浙江师范学院,后收入夏承焘《词学论札》,《夏承焘集》第 8 册,第 88 页。

③ 原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 年第 1 期,后收入《词学论札》,《夏承焘集》第 8 册,第 72 页。

佖非一人。因加作一跋。"所谓"亦先疑",是指胡适《词选》张泌小传中对"旧说"不可靠的"怀疑":

> 旧说,张泌是淮南人,初官勾容尉,上书陈治道,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官内史舍人。后来他随后主归宋,仍入史馆,迁郎中。告归后,寄家毗陵。(杜文澜《词人姓氏录》,《中国人名大辞典补遗》页14略同)此说不知有何根据。但我们以为此说殊多谬误。《花间集》结集于九四〇年,其时南唐建国不及四年。后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余年。而《花间集》里已称张舍人泌了。《花间集》称人的官爵,皆是结集时的官爵,故和凝只称"学士",而不称"相"。所以我们疑心词人张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辈很早,故他的词在《花间集》里列在韦庄、薛昭蕴之后。①

夏承焘跋语,日记不存。该文以《词逡》之名刊发于1934年第2期《中国文学会集刊》,主张南唐张泌和北宋初登第之张佖为两人,以胡适《词选》之论"甚久而未详",复加申论,较胡适所论更加周密:

> 案欧阳炯《花间集序》作于蜀广政三年四月,其书称炯为舍人、和凝为学士,即二人广政三年四月之仕历。(炯以广政三年之前六载为中书舍人,后八载为翰林学士;和凝前三载为端明殿学士,同年九月拜相。)知炯序作于《花间》结集之时,胡氏所考,既得实矣。广政三年《花间》结集,犹在保大十一十二年张佖等(当作登)第前之十四五载。保大间徐铉送序称佖年少气盛,则《花间》结集之时,佖盖方在髫龄,安能擢官舍人,其非即花间词人,灼然可据。
>
> 胡氏疑泌为蜀产,今案《全唐诗》十一函载泌诗,多高唐巫峡景物,江城子词亦有"浣花溪上"之句,则是蜀人无疑。《诗余》云淮南,固非;《词林纪事》云"淮南人",亦失考也。

要之,夏承焘后期的词学,虽然在词的起源和词史方面,推翻了早年所赞同的胡适"长短句词调起于中唐"说,认为词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隋唐之际的敦煌词,并由此确定词的源流正变。但其中所贯穿的民间文学立场,则仍是受到胡适、郑振铎一派新文学史家的影响。

四

夏承焘对胡适学术的关注相当广泛,当然不只局限于词学方面。在接受胡适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方面,对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的接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1928年9月4日,夏承焘费时三日将胡适《白话文学史》读完后所写日记:

> 此书搜集甚富,颇多新见解。如谓一切新文学来源都在民间,建安文学之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考故事诗起来之时代,考佛教唱导梵之法,考王梵志与寒山,论天宝乱后文学之特色,论卢仝、张籍白话诗诸节,皆自负辛苦得来之见解。全书当以第五章汉末魏晋的文学,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考孔雀东南飞首二句),第九、十两章佛教翻译的文学,十一章唐初白话诗,十四章杜甫为最佳。至谓汉代乐府即后世之教坊,五言诗体至阮籍始正式成立(页七十二),儒生诵书音调出于梵呗(页二〇五),白话诗四来源:一民歌,二嘲戏诗,三歌妓之引诱,四传教与说理(页二二二),如杜甫兵车行诸篇,明白反对时政,三百篇后不曾有(页三二五),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页三五五,又四一四),以诗为第二生命,是杜甫后之新风气(页三七五杜诗云:至亲惟有诗,抱心死有归。)则不敢尽信。须待献疑者:十一页"一部廿四史从何处说起",引文文山语而误;十三页引朱虚侯耕田歌,指为白话无韵诗,不知"疏"与"去"韵,皆当改正。胡氏长于考证批评,他日如作《中国学术大事表》,文学一类此书可参考者甚多也。
>
> 胡氏谓:"杜甫以前诗皆不严肃不真挚",似见天宝乱后文学之特色章,然若苏李河梁、子建赠白马王彪、仲宣七哀等,岂可一概论耶?

夏氏赞胡适论杜甫一章写得好,在对杜甫的评价方面,二人的看法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或者说他多少受到了胡适的一些影响也不为过。比如胡适强调时代巨变对诗人的影响,认为安史之乱惊破了一些人(当然也包括杜甫)的太平迷梦,让他们觉醒,变得深沉、严肃。② 夏氏也一再地说:"非有安禄山,逼不出杜甫。杜甫如无禄山,亦俱为'朝叩

---

① 胡适:《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0页。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龌蹉士流耳。”(1942.12.28)“老杜若少年遇此大变,亦不成大家。杜之境遇,乃一部唐诗之缩影。”(1943.4.26)胡适说“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处求自然”①,夏氏认为“杜诗佳者,直接风骚,皆清空如话,若《三吏》《三别》《同谷七歌》《北征》《彭衙行》皆是”(1940.5.10)。但夏氏强调的是经营之极然后出以自然,所以他不能同意胡适“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胡适看重杜甫晚年的“小诗”,它“用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法门”②,夏氏说“唐人多以口语入诗,杜尤夥颐,前人评泊,每误认为炼字琢句,须为一湔洗也”,或亦受此影响。但他并不同意胡适“五言诗体至阮籍始正式成立”之说,而是“主五言诗至杜甫始大成”(1930.10.19)。③ 夏氏赞“十一章唐初白话诗”,则是深受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史家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观点的影响。但他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接受主要在观念上,如“一切新文学来源都在民间”,涉及具体的问题则往往保留自己的意见,除上文所引外,如1929年6月20日夏氏阅《云溪友议》“得王梵志一条,诗十八首,胡适《白话文学史》所未引者。中数首且较胡引者佳”。

夏承焘对胡适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一直关注。他在暑校听胡适讲《古代哲学史》课程,并作《墨子哲学长处和短处》论文,已见前述。1935年7月17日,夏承焘重读胡适《白话文学史》时,有“似不及其《哲学史大纲》”的评语,可见他读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且评价较高。《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初版)是在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蔡元培作序,属新学名著。夏承焘在词学、文学史研究方面,对胡适的观点是既有肯定,又有商榷;但对其哲学论著则罕有间言,这是值得注意的。如1936年3月19日,夏承焘“阅《胡适论学近著》”,此后数日一直陆续读此书。3月23日,“阅胡适《说儒》,为之叹服。此文近人虽多驳议,然自足益人神智”④。该书卷二《神会和尚遗集序》,夏承焘早在1932年3月3日“阅胡适校《神会和尚遗集》”时已读过,且谓“胡适卷首一传,考证甚详,许为禅门革命急先锋,以马丁·路德比之”。

胡适治学,重视文献与考据,所谓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体现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术规范。夏承焘读其《词选》《白话文学史》,言其“考订颇确凿”,又说“胡氏长于考证批评”,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因此也很留意胡适有关治学方法的论述,如1929年7月7日“再阅胡适《治学方法与材料》《小说月报》新年号⑤,洵有价值之文字。”

当然,要了解一位学人的学术,把握其治学方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多读其著作。夏承焘不仅熟谙胡适以《词选》《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代表的国学著作⑥,对胡适的其他著作也多有涉猎,其日记中记载读过如《章实斋年谱》⑦、《胡适文存》(1929.10.5)、《胡适文存 三集》(1930.12.27)、《四十自述》⑧(1931.3.20)。胡适翻译的外国文学,夏承焘也读过数种,如1928年12月1日,“见胡适译拜伦《哀希腊》一首,甚爱之”。并且认为柳亚子“译拜伦《哀希腊》五言诗,不若胡适以骚体行之”(1928.12.23)。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211页。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208页。

③ 参看刘青海《夏承焘诗史研究初探》(《中文学术前沿》2012年第2辑),此处不再详述。

④ 《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所录多为胡适近五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著作,《说儒》列卷一第一篇。

⑤ 最早刊发于《新月》1928年第1卷第9期,第8—24页。后收录于《胡适文存》。

⑥ 胡适国学著作当然不止这些,夏氏读过的也不止此。但这三部影响较大,且与夏氏自己的研究关系最大。

⑦ 见其《天风阁学词日记》1935年12月28日、29日以及1936年2月15日日记。

⑧ 胡适《四十自述》曾经分章节陆续刊载于1930、1931、1932年的《新月》杂志,夏承焘读到的是《新月》1931年第3卷第10期,题为《在上海(二):〈胡适自述〉的第五章》。

1930 年 12 月 15 日“夜阅胡适译哈代《米格儿》短篇小说,甚佳”。

夏承焘热爱山水,读过很多传统的山水游记,对以白话文写作现代游记有兴趣。1929 年 3 月 24 日,夏承焘“夜阅胡适《庐山游记》,止有考据二三则,他无足观。其白话文无描摹山水佳语”。这不免让他失望。确实,夏承焘和胡适的日记中都不乏文献考据,但与夏承焘用浅近文言所写之《天风阁学词日记》相比,《胡适日记》确实少了一点韵味和美感,这里面有白话和文言之分,也有两位学人性情之不同。夏承焘由此对文言和白话各自的优长有一番新思考:“近人以俚文刻划山水者,详尽信过古人矣。而过求详尽,词句不得不长,一花一木,须百字方能模范。翻《水经注》及柳州诸记,读之简冗悬绝矣。此类笔墨,古来小赋、古文、旧诗,皆不可废。”(1929. 5. 17)这里“以俚言刻划山水”的“近人”,所指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他在 1929 年 10 月 9 日更是明确地谈到自己对文言和白话二者关系的看法:“阅刘大白《白屋文话》完,无多意思。以白话文为人话文,以文言文为鬼话文。其实称今话文、古话文最妥,不必故为惊人语也。胡适一跋,亦不大好。……予于白话文言,无所袒护。要之应择地而施。”由此可看出夏承焘对白话文的态度较胡适更为平实,认为文言和白话不可偏废,“要之择地而施”,和胡适立场并不完全相同。

总之,作为 20 世纪初在新文化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夏承焘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夏氏尚未正式走上学术道路时,胡适已经成为新文化的弄潮儿,新文学革命的领袖,这造成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夏承焘对胡适的接受和辨正。尽管今天看来,夏氏在词学方面的总体成就早已超越了当初的胡适,但是当我们论及他早期的学术道路时,仍不得不提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史家对他的重大影响。具体到词学研究方面,胡适词学也是夏氏词学的渊源之一,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根据《天风阁学词日记》等相关文献的记载,胡适是夏氏早年问学的第一位新文学史家,可惜没能得到胡适的回应。这两位对 20 世纪词坛影响巨大的学者就此错过,无论是对当时渴求名师指点的夏承焘先生,还是对整个词史的发展来说,都应该是一个遗憾。

The Ins and Outs of Xia Chengtao's *A Letter to Hu Shizhi on Ci-Poetry*

Liu Qingh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Being famous for his traditional poem-writing and study on *Ci*-poetry, Xia Chengtao's (夏承焘) academic research was deeply rooted in old Chinese learning. Xia was born in 1900 and went to Summer Class of Nanking Higher Normal School(南京高师暑期学校) in the early stage of his life, where he sat in on such courses as *Vernacular Grammar* (《白话文法》) lectured by some prominent scholars of new Chinese learning like Hu Shi (胡适). And in his academic research,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views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advocated bythe historians of New Literature like Hu Shi. As for the study of *Ci*-poetry, Xia repeatedly read A *Selection of Ci-Poems*(《词选》) by Hu Shi. He wrote *A Letter to Hu Shizhi on Ci-poetry* (《致胡适之论词书》), intending to have a discussion with Hu about some concret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i*-poetry. Though he received no answers from Hu, he never stopped paying attention to Hu's academic research. In his views about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Ci*-poetry, we can find some traces of influence made by the perspectives of folk literature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advocated by Hu Shi.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s and outs of Xia Chengtao's *A Letter to Hu Shizhi on Ci-Poetry*,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Xia's *Ci*-poetic study, but also act as a specific case to 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old Chinese learning and new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Xia Chengtao (夏承焘), Hu Shi (胡适), study of *Ci*-poetry, Summer Class of Nank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南京高师暑期学校), old Chinese learning and new Chinese learning

(本栏责任编辑　郑　园)